

第四章 江、胡時期民族主義文化角色變遷與發展

鄧小平時期，中共從後毛時期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轉變成為以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為中心思想，在經濟層面上，鄧小平適時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共可以從百廢待興的文革泥沼中快速的掙脫，進行一系列有效的發展與改革工作，社會上充滿著與過去不同的氣息。

就在同時間，鄧小平雖然將毛澤東的「實事求是」重新擺入到中共的理論框架中，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但他的開放，僅限於經濟層面，對於文化以及意識形態方面，鄧仍然試圖擺脫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傳入中國，或即使社會上已出現了許多要求在政治領域進行同步改革的聲音，他仍有效的以這些都是「精神污染」、「資產階級的玩意兒」等話語，將西方的思潮限制在知識份子領域之中，或甚至將這些知識份子給予逮捕、入獄，以此彰顯他雖然支持改革，但那只是某個領域、某個範圍，一旦知識份子的要求超出他所能接受的範圍，則勢必要受到處罰。

在鄧統治後期，中共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¹要求政治改革的學生、工人與大眾，與保守的領導階層發生了激烈的對抗，造成了許多知識份子、學生以及人民的傷亡，中共因此受到世界各國強力的譴責，並對其實施經濟制裁的處罰，很多論者都認為中共這下子勢必得做出些讓步，以換取國際社會的重新支持與原諒。但是，鄧小平再度展現他的獨到見解，依舊堅持中共的作為。他在1989年與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會面的時候，甚至認為要結束中國與美國的僵持，必須由美國主動，而非中國，他說：

¹ 六四事件，「六四事件」是以宣佈改革開放為基本國策、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爭論為背景，在大規模的學生、民眾的遊行，以反貪污，反腐敗，反官倒等示威運動中開始，但是學生團體和政府之間在交涉中未能達成共識和政治妥協，最後以政府召集軍隊武力鎮壓造成若干市民和學生死傷而告終。一般認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其焦點則在天安門廣場，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這一期間進行了表達各種政治主張的示威遊行。一般政治評論家認為此次事件導致了自1978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眾多爭論時至今日也尚未解決。請參閱，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台北：風雲時代，1996)。

「…北京不久前發生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首先是由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煽動起來的。很遺憾，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捲入的太深了，並且不斷的責罵中國。中國是真正的受害者。…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只能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感，使中國人奮發圖強…請你告訴布什總統，結束過去，美國應該採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採取主動。美國是可以採取一些主動行動的，中國不可能主動。因為強的是美國，弱的是中國，受害的是中國。…」²

世界各國雖然以經濟方式制裁中共，但卻沒有一個國家與其斷交；而鄧小平日後更將「六四事件」定性為一場「反革命的暴亂」，甚至是一場「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對立鬥爭。³在這場動亂之後，鄧的接班人再度更換，由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出乎意料的進京一舉躍上黨的總書記職位。一般咸認，此乃江澤民在動亂期間仍能有效穩定上海的秩序，並恪遵黨的指示所致。

鄧小平時期，中共在改革開放的同時，適時運作民族主義，企圖將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意識形態帶來的影響降至最低，雖然經過了三次的反自由化運動，但最終仍在鄧晚期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一個由青年、工人發動的要球民主開放的運動；當然，在這種情況底下，對於老革命的鄧小平來說，可說是見怪不怪，老神在在，並依然相信中國人民有能力在世界格局中屹立不搖。⁴不過，很清楚的，我們可以了解一個現象，那就是從毛澤東時期，到鄧小平執政的年代，整個中國的民族主義幾乎都是由上層統治階層，也就是由中共政府、黨領導人在推動的，人民大眾多只是隨著政府的口號與政策起舞，甚至被政府所創造的「新文化」或「新傳統」所制約，明顯處在一種較為被動的地位。

² 鄧小平，「結束嚴峻的中美關係，要由美國採取主動」，載於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30~332。

³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台北，時報，2001)，頁1025~1026。

⁴ 冷溶、汪作玲主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頁1287~1288。

相反的，從江澤民成為總書記之後，在鄧仍在世的幾年之中，他仍恪守分際，以不逾越鄧之作為與論述為原則。等到鄧在九七年初去世之後，江才可說是真正成為中共的領導人。⁵在江掌權的幾年內，中共的經濟發展更加快速，但也因此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觸更多，也使得江與中共更需要民族主義的保護，以降低西方世界所帶來的衝擊。很有趣的是，這個時期中的民族主義，雖然仍舊多以政府發動為主，但人民已不再只是消極的配合，而是積極的參與；更有甚者，晚期的情況甚至顛倒過來，民族主義變成一種民間潮流，上層政府反而只是一個配合的角色。

很重要的一點，在於江澤民建構的一些論述，較之毛、鄧則更加的「以中國為主體」、刻意顯示出「中國中心」的重要性，也更能夠引發人民的共鳴；鄧小平時期在這方面的工作，其實已經下了相當大的功夫，也確實收到一定的效果；不過，鄧小平的民族主義策略，他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隱含著以社會主義為本體，配以「中國特色」的概念，希冀走出一條不同於以往的社會主義道路。但江不同，江澤民透過「三講」、⁶「三個代表」等論述的發表，將改革開放的中共路線，完全的拉至「中國中心」，以致於更能夠收服民眾與知識份子，使得這種民族主義的策略更加的成功。或許他的論點似乎都以「中共」黨的地位為重，不過江澤民也順利的將中國幾乎等同於中共，使得中共的作為都成為中國的作為，中共也代表了中國，人民順應中共、服膺中共，也就是順應中國與服膺中國。

⁵ 一般說來，關於江澤民何時成為中共實質上的領導人，有幾種說法：1995年提出「論十二大關係」或是1997年鄧小平去世之後；請參閱，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頁129。

⁶ 三講，是江澤民1995年在北京進行考察時所論述的概念，包括要求人民要能夠「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請參閱，江澤民，「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載於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483~486。

等到江交棒給鄧之隔代指定接班人胡錦濤之後，⁷中國實已成為整個世界全球化浪潮下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胡錦濤上台之後，陸續提出「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乃至於「和諧世界」等概念，進一步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的概念舊瓶裝新酒，且發送至國際社會之中，營造出一種和諧的意境，降低「中國威脅論」所帶來的影響；⁸以胡錦濤在 2005 年聯合國 60 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為例，內容包括盡快消除重度窮國對中國的債務問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 100 億美元做為貸款以及優惠出口信貸，協助進行發展；改善特別是非洲國家的醫療措施，並通過中非合作論壇等措施；推動國際政經新秩序以及建構和諧世界，這樣類似的宣示，一定程度體現出中國於新世紀中在國際事務中所要扮演的角色。⁹

本章將討論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中共民族主義策略底下，中國「傳統文化」的復甦與重出江湖，並藉以分析為何在這段期間內，民族主義浪潮會從「上熱下冷」→「上熱下熱」一直到「上冷下熱」這樣一段過程，從中討論這樣一種民族主義的生產過程與前兩個強人時期的發展情勢有何異同之處。

第一節 「三個代表」的意涵

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中共的領導班子替換過程，隱藏著相當多的曲折離奇故事；但不可諱言的，一旦這些領導人地位穩固之後，他們總能

⁷ 隔代接班人，意指胡錦濤在極為年輕之時(40歲)，就成為中共最年輕的候補中央委員，並再 50 歲時一口氣從中央委員躍過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委員，成為政治局常委第七名之人，儼然成為新一代中共政治明星，而這一切，除了胡錦濤本身的資歷與經驗之外，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所提出的希望多點年輕人進入領導班子的想法，亦影響其日後的發展，一九九三年，胡又接任中央黨校校長，主掌黨的理論教育、培訓等工作。一九九七年鄧小平過世，但是在九月召開的十五大，胡錦濤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依然由第七前進到第五，顯示江澤民也不太能更動鄧小平的安排，隨後胡在九八年擔任國家副主席，九九年任中央軍委會副主席，並在日後接任中共總書記以及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等職務，成為由鄧小平越過江澤民所指定之「隔代接班人」。請參閱，胡全威，「解謎：中共跨世紀接班人胡錦濤初探」，[國政分析](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NS/091/NS-B-091-005.htm)，<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NS/091/NS-B-091-005.htm>；楊中美，*中共新領袖胡錦濤*(台北，時報，2002)。

⁸ 中國威脅論興盛於 90 年代之中。西方社會從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開了對「中國威脅」的具體論證，強調中國在未來可能所帶來的影響與威脅，請參閱，Richard Bernstein &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1997)。

⁹ 丁永康，「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北美國事訪問及聯合國高峰會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12 期(2005)，頁 2~3。

夠發展建構出一套屬於自身的「論述」，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直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與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等。這些論述看似都有其特殊之處，但在異中也都有同，同中亦有異，可說是互相影響，互相證成的動態過程。

嘗如前章，我們可以知道，鄧小平時期的民族主義策略，主要是以抵抗來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潮為主的一項工作。他建構一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論述，並配合「反自由化運動」等措施的配合，將西方所產生的影響降至最低；但很有趣的，他雖然試圖走出毛澤東時期太過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思考中心的邏輯，但因為種種的因素，包括其統治的穩固、共產黨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等課題，他在建構這樣一套論述時，仍得將馬列以及毛思想奉為形式上的圭臬與準則，而中國文明、傳統文化在這樣一種論述的建構下，事實上是扮演一種輔助的工具，一種結合各時期動態發展所得出的動態結果，對內是創造一種想像的共同文化，對外則是一種與西方思潮抵抗的工具，一種民族主義策略下的工具，但與毛時期不同的是，毛澤東思想在毛後期變成了「中國文化」，一種僵化的文化，而鄧時期則較之更有彈性，即使他仍以「四項堅持」來壓制多元的發聲空間。

鄧小平的這套論述，儘管他的內涵與實際作為與馬列毛的精神已無太緊密的相關性，但基於上述種種因素，他仍必須抓緊他個人與馬列毛思想的臍帶；江澤民在這一點上，則有別於鄧小平的做法，他在兩千年初於廣東考察時所提出的一段論述，可從中看出一些端倪：

「我們黨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並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奮

鬥。」¹⁰

這段論述，就是往後被稱為「三個代表」的內容，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到江澤民基本上都是以「中國」為出發，雖然它是一個以中共發展為主的論述，但也明顯的透露出江與毛、鄧論述的不同之處。基本上，這是一套試圖奠定中國共產黨地位的論述，它同時也企圖使得廣大人民對於中共的施政能更給予支持與保護；不過，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處處提到「中國」，這樣的提法，更能夠加深人民對「中國」的印象與認同之感。

鄧小平時期，由於剛剛從文革的廢墟中進行改革開放的運動，同時，他又必須「承接」著由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以來的共產黨血脈，因此，他雖然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企圖從中國中心為出發點，改變長久以來的弊病，但仍必須提及由馬列毛所一脈相傳的思想與邏輯，亦即，他在許多層面的政策施行中，仍受制於其個人的革命經驗、其與毛長久共事下來所累積的情感等等。以致於即使他是一個更為實際的實用主義者，但依舊得將馬列毛的地位與「中國」並列，甚至超越中國；隱晦的說，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期間，雖然以民族主義的力量，降低外國勢力、自由民主浪潮與蘇東波的影響，¹¹但是在有形與無形間，這樣的民族主義力量，卻又是受著馬列毛的遺緒所影響，可以說，鄧小平時期雖然試圖跳脫過往，但仍然被過往所羈絆牽制。

「三個代表」這樣一種以「中國」為主體的論述之所以出現，除了政治、經濟的作用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世紀之交的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歷練，實已成為世界上、全球化下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西方的生活習慣、文化

¹⁰ 江澤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好地做到三個代表」，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2。

¹¹ 蘇東波，是八零年代至九零年代初期原東歐共產政權與蘇聯政權陸續垮台的現象。請參閱，李英明，**文化意識形態的危機—蘇聯、東歐、中共的轉變**，第一~五章；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頁266~285。

潮流，也無可避免的傳入中國，甚至成為一種流行文化，在年輕一輩上班族及青年學子中蔚為一股風潮。也就是因為中國已經儼然成為與美國、俄羅斯等世界大國並駕齊驅的一國後，更不能夠忍受這些「外國文化」的過度影響與制約，以免整個中國的「獨特性」與「特殊性」被消除、被抹滅。

其實，中國至清末民初以來，整個民族由於受到帝國列強的侵略，對於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不小的微詞，甚至厭惡；而中共在其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對於受到外國勢力的入侵，不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或是共產世界老大哥蘇聯的影響，都企圖把他們所帶來的影響降至最低，而通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建構一套民族主義的論述，建立出一套我/他、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樣的對比概念，透過報刊的宣傳，透過領導人的大聲疾呼，透過政策的力量，在有形無形之間使人民大眾都能夠接受到這樣一種民族優先、民族利益、民族第一的印象，以壓制西方文化在中國內部的流傳。

而「三個代表」之所以受到重視，也就是它代表了中共在逐漸融入國際社會之後，仍強力的要阻擋西方文化的大規模擴散與傳播，或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在日益全球化的情勢底下，中共雖然更加開放其自身，但也企圖將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中國化」，如同羅柏森(Ronald Robertson)所指出的，全球化不只是歐美強勢文化在世界上的同質化過程，亦是各區域、各國家間不同文化意涵的異質化過程。¹²也就是說，現實的國際社會中，很難有單一的世界觀和價值邏輯概念，不能夠要求任何一個國家盲目追隨他國腳步，這樣只會造成在文化全球化過程中，弱勢國家變成霸權支配下的棋子；但國家發展更應該配合全球在地化的理念，將全球化與本土化搭配，將普遍配合特殊。

全球化最主要的問題在於，西方強勢的文化權力宰制了其他地區的文化傳播

¹² 請參閱 Ronal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London: Sage, 1992).

能力。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就認為，目前所謂的全球化，仍多是以西方的價值觀作為中心，忽略了不同地區所擁有的差異性，因此不只要形成同質性的文化困難，要消除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亦是困難。中共乃至於江澤民，基本上已體認到這樣一種情況，因此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樣一套中國新文化的架構底下，提出了「三個代表」以為補充，甚至企圖以「三個代表」作為全球化底下用以抵禦外來力量的一套論述工具，或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唯一工具。¹³

基本上，這樣一套新的論述，相當程度的仍是以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我們可以從中共的歷史發展過程看出，只要中共面臨到這樣的文化衝擊時，多會使用類似的手法來降低他國的影響。「三個代表」可說是中共在面臨全球化這樣一種更新穎的挑戰底下，所孕育而出的一套新的論述。就字面意義來看，它強調中國共產黨長久以來的正確路線創造出正確的文化、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以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民族的載體，中共的領導人、為其服務的知識份子以及各個領域的學者專家，有效的運用這個載體，使中國得以長期有效的進行發展的工作，而不會受到外來勢力太強力的影響，即使挑戰依舊存在。

很明顯的，這樣的一套論述，是以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宣稱源生於中國本土的政黨作為論述的載體，強調「中國共產黨」長久以來的奉獻，企圖以「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內部的優越性與首要性，強化人民的認知與認同。尤其在這樣一種全球化的影響之下，中國內部的某些人士心中又開始浮現二十世紀初期列強環伺的情景，深怕中國若抵擋不了西方浪潮的侵襲，則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後遺症。因此，江澤民適時的提出了「三個代表」這樣一套邏輯，藉以告訴人民，中國共產黨當以維護中國全體人民的優先利益為原則，並保持中國的主體性，以免對中國再度產生傷害。

¹³ 洪志健，*論三個代表的科學體系*(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 258~270。

有趣的是，中共歷來提出的類似論述，基本上都是在玩「語言符號」的遊戲與建構工作，從毛澤東以來，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中國的救生符、是中國的良藥，到鄧小平強調「馬列毛思想」的重要性，乃至於江澤民提出的以「中國共產黨」為載體的種種論述，雖然涵義各有不同，不過這樣的語言符號，通常都搭配著其他的中國「傳統諺語」或故事，例如「實事求是」、「貓論」等等，¹⁴使一般人民大眾也能輕易的了解，縱使俗語的解釋權已經被中共拿去，但也因為中共身為一黨專制的體制，它輕易的就透過教育以及受限的傳媒影響民眾，人民也就在有意無意間、在一陣薰陶之後接受了這樣的論述。

「三個代表」論述的提出，一方面代表著江澤民試圖創造出一套以他為核心的新一代理論，以維持他領導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標幟著中共在面對西方世界日益以包括人權、民主、能源開發等以「西方」為中心的問題質疑中共、檢視中共的時候，中共已然能夠有效的建構一系列以「中國」為中心出發的論述，將西方所製造的議題影響減至最低；這種中國/西方的差異表現，顯露出中共即使從九十年代初以來陸續面臨了蘇東波、全球化這樣的浪潮侵襲，但仍不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其總是能夠塑造出一套廣大人民都能夠接受的論述，深化入人們的生活之中，即使是偏遠的鄉鎮，也有隨處可見的標語看板在影響著人們。

從孫文革命開始，訴求的就是要中國建立一統的「民族」，建立一個「民族國家」，這樣的民族國家是以市場機制作為載體來運作的，乍看之下似乎顯示其為一資本主義者，但孫文又強調國家社會介入的重要性，也看出他與一般人較為不同的見解，可以說他基本上相信不同的民族國家會有不同的發展模式，他也相

¹⁴ 貓論，由鄧小平在 1962 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中提出的，鄧認為，「不論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1978 年之後，鄧又再度將貓論用來指導中國的經濟改革運動。請參閱，關向光，「鄧小平的貓論何時提出？—評《毛澤東專政始末》之三」，http://blog.xuite.net/gustav_vw/ccphistory/4438742

信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其實是可以相容並存的，¹⁵而非傳統上所認為的有資就無社，是一種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境界。

中共歷經了從毛澤東以來數十年的理論發展，長期以來也同樣力求走出一條屬於中國的道路。但自建政以來，雖然毛依舊堅持走中國自己的道路，但也因此越走偏鋒，整個路線極遽的偏離正軌；也可以說他日益的將其個人的「理想性格」置於「實踐性格」之前，使中國在其統治晚期面臨相當嚴重的災害。鄧小平清楚的看到了這一點，雖然他依舊高舉著馬列毛思想，但與毛不同的是，他借用了資本主義中的市場經濟，並巧妙的將這樣的機制轉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此說明他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信徒、是馬列毛的弟子，並藉以維持其正當性與合法性。很重要的，鄧小平開始融合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某些地方，即使對外、對內他仍強調堅持民族的主體性，以民族主義的力量避免外國文化等等的影響，但在實踐上，他已不再一昧的切割原本對立的二元，而是企圖塑造出新的融合型文化以適合中國的發展。

江澤民亦然，他面對的是更加險峻的資本主義侵襲攻勢，與西方流行文化浪潮的不斷拍打，以致於他必須在遵守鄧小平的指導原則下更積極的找出不被資本主義「溶化」的途徑。因此，「三個代表」孕育而生，江澤民的理論架構也陸續呈現。基本上，由於江面對的中國與西方世界，是在更加全球化底下的兩個大團，而中國實際上並未完全的發展完備，因此，可說是一種「發展中」與「已開發」的較勁；也因為如此，江澤民必須更加謹慎的應對這樣的情況，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邏輯下，仍必須確立中共的「獨特性」與重要性來強化中華民族的「獨特性」，用以激發人民的認同之感。

「三個代表」在這樣的環境下所代表的意義在於，它告訴廣大人民，中共長

¹⁵ 李英明、張亞中，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頁 44~47。

期以來的所作所為，基本上都是為了廣大的人民、為了中國的優良文化在拼搏的；中共是一個特別的政黨，它是融入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並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民眾與中共是缺一不可的，兩者是互相保證、互相證成的。這樣的概念意涵，巧妙的挑動了人民的觀感神經，即使中共在歷史上所做的政策，有許多是帶給人民極大傷害的，但也因為中共的存在，使得西方文化、外國勢力不能夠那麼輕易的就進入中國，給中國帶來影響；有趣的是，普羅大眾多會以民族的立場出發，尤其是中共的宣傳能力相當的堅強，不論是大城市或小村莊，大家不管是什麼「種族」，但都知道自己同樣是「中華民族」的一員；當國家民族面臨到外國勢力的衝擊時，這樣民族主義、民族意識的有效建構，是藉以保護中共特別有效的工具。

第二節 愛國主義的高漲

在江澤民統治至胡錦濤上台這段期間內，中共內部發展出一套愛國主義，一套有效對抗西方影響的辦法。在當時，世界上所認可的霸權，幾乎只剩下美國一個個體，其他如日本、歐盟、俄羅斯甚至中共，至多只被認為是強權，而未能夠和美國所擁有的獨霸地位相抗衡，形成「一超多強」的局面。¹⁶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以美國為代表的文化，在各個領域都有十分傑出的表現，深入到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中，使美國不只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中稱霸，連在較軟的文化方面都形成了其文化霸權的地位。

此外，不同於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是批判以「西方角度」來鋪陳敘述的「東方」，現在的國際局勢，亦可表現為以「美國角度」來看待世界各地的主義，可以有美國自己的歐盟主義、日本主義、中國主義、拉美主義或其他林林總總的狀態。也就是說，從江澤民上台後，其所面對的國際局勢就是以美國為獨霸的世界，美國的權力甚至大到連聯合國都管不了。¹⁷中

¹⁶ 李敘芳，「世界多極化與中國的發展機遇」，*遼寧黨校學報*，第19卷第1期(2004)，頁48。

¹⁷ 例如2004年美英聯軍攻擊伊拉克，即未獲得聯合國的同意。

國如何在這段期間內保持其自身的獨特性，避免被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流行浪潮所制約，是江澤民等中國領導人極欲走出的困境。

在此段期間內，江澤民認為，各個國家都必須尊重互相的獨立以及主權的擁有。亦即，要讓世界和平穩定的發展，或更精確的說要讓中國和平穩定的發展，各個國家所應有的權力或權利就不能夠被剝奪，該是如何就是如何，一切都要依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或是國際共同的規範以行使。此外，江澤民亦認為，要營造一個共同安全的環境，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來解決各地所產生的問題，各國各地區共同協商、共同議論，尋求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方式，促進多方的交流合作。另外，各國都是獨立自主的，其中當然會有大國小國之分，但小國的聲音大國要尊重，大國要能夠保護並提升小國的能力，並且要帶頭維護和平事業，彼此間的合作也不是為了要去抵抗甚至與他方拼搏。¹⁸

另外，由於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在國際社會上逐漸佔有一定的份量，西方理論家也開始重新注視這個曾經熟睡的東方巨人。由於中國可能帶來的經濟、政治力量將有機會超越、甚至壓下長期以來以西方主流為主體操作方式的國際現勢，因此，西方論者也更早的論述出一套「中國威脅論」的概念，試圖闡釋未來中國可能會帶來的威脅。加以中國內部學者提出「中國崛起論」來表述中國的復甦，更使得西方對中國有更大的疑慮。¹⁹不過，很明顯的，這樣的「威脅論」完全是一種「西方中心」的論述，西方主流資本主義社會由於長時間壟斷了國際社會中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不同領域的活動，當他們開始意識到中國可能的復興時，

¹⁸ 江澤民，「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江澤民文選—第三卷**，頁 108。

¹⁹ 中國崛起論，是由鄭必堅 2003 年在博鰲論壇演講所提出的概念，請參照，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未來」，2003 年博鰲論壇演講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OP-c/448115.htm>；由於和平崛起的口號在中共黨內意見亦未能有效整合，並且不能消除西方對「中國威脅」的疑慮，因此，在 2004 年的博鰲論壇中，胡錦濤不再使用「和平崛起」，而只強調「和平發展」。請參閱，陳牧民，「當和平崛起遇上台灣問題：菁英認知下的中國安全戰略」，**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4 期(2006 年 12 月)，頁 1~8。

勢必會在其中形成一種危機感，因此提出「中國威脅論」來提醒西方各界注意中國所帶來的問題。

中國在面對西方世界的質疑，與改革開放以來所遭遇到的種種問題時，包括西方政治經濟與文化各層面的影響、甚至是六四事件所造成的後遺症，從九零年代初期開始，就企圖提出以愛國主義為基調的論述以影響社會大眾的思維，將整個原本是屬於國內問題的層面，上升至與西方競逐、論辯的層次，江澤民在九零年代初期就曾說過：

「我們所講的愛國主義，作為一種體現人民群眾對自己祖國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進歷史發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是同維護國家獨立和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在當代中國，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本質上是統一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鞏固和發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為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和光明的前景，集中體現著國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通過和平演變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剝奪我國人民主宰自己國家命運的權利，使中國變成西方大國的附庸。如果失去了國家主權、民族獨立和國家尊嚴，也就失去了人民民主，並且從根本上失去了人權…」²⁰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領導集團，在面對到西方勢力的挑戰與衝擊時，又把愛國主義提出至檯面上，這樣一種愛國主義，實際上已成為獨特的中國/中共式民族主義的變體，成為一種由民族主義衍伸出來的新形式，一種中共建構出來的一套新的戰略文化，並且也有效的植入民眾的思緒之中，透過更加廣布的教育網絡、社會網絡與傳媒網絡，形成一套有計畫的文化傳遞程序，相當程度有效的用來抵禦了西方的制約與衝擊。

²⁰ 江澤民，「愛國主義和我國知識份子的使命」，江澤民文選—第一卷，頁 120~124。

實際上，這樣一套「愛國主義」的論述建構，是一種長期以來中共為防止西方「和平演變」的抵禦模式，特別是歷經了八零年代末期蘇聯與東歐的政局巨變，中共更加強防守的力道，以維持自身的主體性。由上述江澤民的講話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他很巧妙的將西方用來指責中共的人權、政治等問題，轉變成為攻擊西方試圖介入影響中國的武器，亦即，江澤民認為，西方一旦有效的制約了中國，使中國成為西方的附庸之後，則場景將會重現舊時代中國被西方列強欺凌的景象，「中國人」的各項權利，將會被強力的剷除，「中國人」的「人權」亦將消失殆盡。

基本上，以江澤民為首的領導集團構築出這樣一套「愛國主義」的思維，是一種長期實踐的工作。雖然西方勢力的介入與影響，並未真正的以戰爭的形式呈現，但其所造成的結果，可能會比戰爭所帶來的改變還要大，因此，中共上層領導人會做出如此的反應，希冀藉此減輕所有可能帶來的轉變。²¹這樣一種大型的思想建立工作，若是只訴諸短期的激烈抗爭，效果可能不彰；因此，中共是以教育的形式，從底層、鄉村的教育，到對於大學生、知識份子的再教育，皆是中共最常使用的手段。

中共利用學術界的力量，輔以官方的態度，²²將這樣一套愛國主義有效的進入到人民的思維之中，這種愛國主義的建構，使一些學者認為能藉此鼓動民眾的自發表述並提供公眾輿論的成形，²³他們將反對與挑戰政府的言論、政策，視為對中國前途的否定與阻礙，在中國國內也劃分出一套我/他的標準，用這樣一種態度與手法，強調中國獨特性與主體性的重要，藉此避免中國的特殊性在面臨全球化的侵襲之下，會被西方、或可以說美國文化、美國價值所取而代之。

²¹ 劉慶元，*解構中共國家安全戰略*（台北：揚智，2003），頁 180。

²² 黃煜、李金銓，「九零年代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0 期（2003 年 6 月），頁 56~59。

²³ 徐貴，「九零年代中國的民粹政治和後現代犬儒主義」，陶東風主編，*知識份子與社會轉型*（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頁 147~148。

而這樣一種愛國主義地位的提升，其實也透露出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後，雖然鄧小平與中共領導階層陸續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新型的、再建構出的各項論述，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浩大工程陸續推進，以及與西方更近距離的接觸之後，似乎這樣的一套論述，並未能夠真正的形成完全深入人心、深植於民眾邏輯思考中的「新文化」，或至少這樣的地位仍未鞏固；也就是說，這樣一套「新文化」，雖然強調從中國實際層面出發，看似更貼近一般人民大眾的想法，但人一旦在與他人接觸之後，必然會有許多新的想法產生，也就是這樣，與西方接觸的過程中，中共一直極力將影響層面限制在經濟範圍之內，避免過多的互動，影響了人民的思考與觀感。

既然中共已經從「中國本體」出發，建構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為何其又必須塑造一套從「民族主義」衍伸而出的「愛國主義」？其實，原因就在於，中共與其領導階層對於西方勢力的衝擊，仍有相當程度的擔憂，加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似乎未能降低西方自由民主的影響，甚至造成六四事件的發生，因此，中共有必要再形塑一套更加容易讓人民接受的民族論述、或以民族國家為本位的方針，這樣一種完全從人民大眾出發的立場建構，才能夠有效的貼近大眾，也才能夠同時的消除過多外來的影響。

這樣的做法，其實也就是一種以「文化」為本位的中心主義重出江湖的現象。中共透過愛國主義的操作與散佈，在平民大眾間製造新的輿論文化，強調「中華文化」的獨特性與不可替代性，藉以抵擋外來的影響，這亦是中共長期以來為避免中西碰撞所產生的「不良影響」而使用的做法。只是，在九零年代初期，由於中國大陸內部現實（改革開放十年效果未顯）、政治情勢（例如六四事件剛結束）的影響，這樣一種行為幾乎都是由上層政治領導單位帶領負責，上位者往往熱情如火，而民眾之間的情緒則沒有那麼激昂；但隨著時間的移轉，中共經濟的起飛、復甦，使中國往昔的尊容感又在社會間開始流轉，也造成民間一股愛國主義或民

族主義昇華的力量，亦讓中共進行的各項發展工作愈趨穩定。

尤其在九零年代晚期，中共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恰巧陸續發生了幾次衝突，包括九九年發生的北約部隊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使館事件，亦帶給中共不少的著力空間。江澤民曾這樣說道：

「…無論發生什麼事，有一條我們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就是要加緊把我們自己的工作做好，大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民族凝聚力。…在這個世界上，最後還是要拼實力的，我們要臥薪嚐膽，一定要爭這口氣！…對廣大學生和群眾這種愛國主義的行動，要充分肯定，予以支持。…在這樣的時刻，要十分注意保持社會穩定，各項改革和建設工作要繼續有條不紊地進行…既要表現出全民族同仇敵愾的氣勢和力量，也要向世界表明我們中華民族泱泱大國的文明形象…」²⁴

江的論述，並未因此將此事件上綱到民族國家之間的對抗，試圖製造更為混亂的國際局勢；他反而在這樣一種輿論完全支持中共的時候，除了一面肯定愛國主義的表現，更要求經濟與各項建設的持續穩步發展，這一種現象表明他的思緒與邏輯仍是相當清晰的，他力求將這樣的愛國主義情緒，轉至改革發展的動力。很清楚的，他體認到當時的現實情況，中共仍然不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們的對手，想要與他們並駕齊驅甚至超越，只有持續的發展與進步，才是最有效的做法。也因此，中共內部的抗議示威活動，並未造成其與美國等北約國家太嚴重的敵對，反而因為這樣一種「國際現實」，使中共能以一種受害者的立場獲得其他國家的同情，並繼而再穩定延續其改革與展的工作。

基本上，從江時期到胡錦濤時期，愛國主義一直都是中共創造「新文化」的主軸。過往中共注意的是國內各民族有效的融合，是一種「種族民族主義」與「國

²⁴ 江澤民，「同仇敵愾，團結禦侮」，*江澤民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323~324。

家民族主義」相互搭配的情況；相反的，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儒家思想之討論，在這段期間又趨於加熱，以愛國主義為本體的復興型民族主義，²⁵成為新階段中共內部的面對外力影響時很有效的武器，亦即，這樣一種民族主義的流行，使得中共能夠抵抗隨全球化而來的西方文化衝擊，並且藉由宏揚中華文化，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加入符合實際狀況的新內涵，進而構築出一套新的文化結構，乃至於以此穩固國家結構。²⁶

這種「新傳統」的製造與產出，結合了「中華傳統」與實際的走向，有效的抓住人民大眾的思維，這同時也代表了江澤民將鄧小平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了概念上的填補，因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以和平發展為其概念的主軸核心，雖然其亦強調維護中國的主體性，並配合反和平演變、反精神污染等作為，企圖降低西方流行文明的影響，但再怎麼防，總是會有百密一疏的情況發生，以致於最後在八九年發生六四事件。而江澤民延續著鄧小平的改革路線，不過其將鄧時期的防禦性文化，轉化成為有效的愛國主義，在平民社會大眾間加以流傳。也可以這麼說，鄧小平與江澤民雖然都是力求維持中國的主體性，但彼此面對問題的手法有明顯的不同，鄧小平的鎮壓與壓制人民思想行動往往都是全面性並且明顯，江澤民雖然也做著同樣的事情，但更能將這些作為轉變成為愛國、追求民族大義的表現，這是他有效運用民族主義所帶來的結果，也是中共能夠藉以壓制西方影響力的重要做法。

第三節 「小康社會」到「和諧社會與世界」

雖然中共一再宣稱絕不當頭，要韜光養晦，不稱霸；但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

²⁵ 復興型民族主義，是由學者王賡武所提出的。他認為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將中國過往的光榮與對未來美好的期盼相結合，除了關注對政權與領土的完整性外，這樣一種民族主義還試圖保留傳統的道德文化與價值，對於提升人民大眾的信心與動力，有相當大的幫助。請參閱，Wang Gungwu, *Bind US in Time: Nation and Civilization in A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2), pp.114~115.

²⁶ 花永蘭，「民族主義：中國歷史與現實的路徑選擇——中華民族主義分析」，*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0卷第3期(2007年7月)，頁60。

其種種的舉措已經讓各國注意並且甚至有「中國威脅論」的論見產生。中國內部則有以鄭必堅所提出的「中國崛起論」做為對於中國經濟或政治實力或軍事能力突飛猛進的代稱，不過由於受到外國的質疑並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中共已不再使用並禁止使用。但是，中國在經歷改革開放將近三十年之後，確實已經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甚至是全球注目的焦點。

當然，隨著在經濟上的成功與大幅的進步，中共歷經了鄧小平、江澤民的領導統治後，其實力更不如小覷。當中共新一代領導人胡錦濤上台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重要性可說是日益加強並顯而易見。特別是當佐立克(Robert B. Zoellick)提出希望中國成為一個與美國共同管理全球事務的行為者時，²⁷中國的國際地位一下子變的好像與美國並駕齊驅似的。但仔細來看，美國的這種論述，其實仍是處於相當不正常的一種心態，因為，中美之間對於彼此軍事能力或透明度皆有所質疑；而在一些區域組織問題上，美國亦意有所指的認為中國排除美國的參與權(例如上海合作組織)；同時，關於經濟問題，人民幣匯率的調整與否亦使中國認為美國介入內政太深；此外，中國追求的是獨立自主的外交與政治行為，也不希望與他國輕易的合成行為體；甚至一旦與美國共管世界，就必須介入更多戰亂中的區域，也同時違反了其尊重地區自主發展的堅持。²⁸

以上的種種，都使得中國在短期內很難與美國一起「共管」世界，在可見的未來，我們應也不易看到這種情況的發生，至多只是在一些區域性的問題會有賴於中國的主要力量，例如朝核危機。因此，胡錦濤的政治路線，是否仍是在追尋前人的腳步，致力於一個多極化和諧世界的產生，這個問題的答案，目前來講，應該是肯定的。以胡錦濤在 2005 年聯合國 60 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內容包括盡快消除重度窮國對中國的債務問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 100 億美元做為貸款以

²⁷ 丁永康，「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北美國事訪問及聯合國高峰會評析」，*展望與探索*，第三卷第十期(2005)，頁 4。

²⁸ 陳一新，「從布胡會看美中臺關係走向」，*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12 期(2005)，頁 3~4。

及優惠出口信貸，協助進行發展；改善特別是非洲國家的醫療措施，並通過中非合作論壇等措施；推動國際政經新秩序以及建構和諧世界，²⁹這些談話，也讓我們看到中國對於多極化世界或是世界和諧發展的關注力仍沒有下降，雖然談話中有些話語是令人感到矛盾的，例如中國以其本身亦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何以能夠提供金錢給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發展；或是要為了發展中國家培養人才，這些措施，似乎是一個已開發國家才能有所作為的。

中國在其內部發展失衡、問題叢生的情況下，之所以願意提出這些做法，可以說是經過相當的算計，亦或是縝密的測量。不論在胡錦濤執政至今或是剩餘的任期內，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參與將會越來越多，是可以預見的。而其走的或堅持的，將會是不同於美國的單邊主義，也是可以猜想的到的。至此，我們應該有所認知，那就是中國歷經改革開放至今三位不同的領導人的統治，對於世界多極化或中國對於多極化目標的追求，可以說是有志一同，但做法可能有些許的差異；這樣的一種追求，其實與中共堅持民族的主體性是有很密切的關係，亦即，中共自毛澤東以來所秉持的獨立自主傳統，就是號稱以尊重各民族、各國家不同的狀況、不同的社會模式出發的，各國不能夠介入干涉他國內政。當然，中共是否真正做到類似的要求，則仍值得商榷。

其實，中共在各面向上之活動，實際上仍多宣稱堅持「民族」的主體性與能动性，這樣的堅持並未因為改革開放之後與西方多所接觸而有了動搖，甚至更為堅定，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即使中共想要成為與美國一樣的「世界警察」，他也不會因為美國的「要求」而加入美國的行列，而必定是會在評估各項客觀因素之後，獨立的作出理性抉擇的行為，以避免與中共長期以來所堅持的獨立自主產生衝撞。特別是在現今的狀況底下，中共內部歷經了改革開放的洗禮後，實際上已浮現出相當多的社會問題必須解決，若在這樣一個階段中，就冒然成為國際間

²⁹ 丁永康，「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北美國事訪問及聯合國高峰會評析」，頁 2~3。

的新霸主或仲裁者，則有相當的危險性與不確定性存在；這樣一種行為，可能會使得中共內部的民族主義轉向，由對外的方向轉變成對內、對統治領導者的批判，如此一來，對於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工作將會是另一波可能的災害。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確確實實如同鄧小平所說的，已讓一部分的人先富了起來，中國也再度躍居世界舞台中心，成為鎂光燈的焦點。但在中國內部，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問題是，包括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東/西部開發狀況與沿海/內陸開發的差異性也更形加大、過度開發造成環境污染、以及各種公安問題等等，已經不單單只是中國自己的痛處，甚至也一定程度了影響世界各國的經濟脈動與行為觀感。這樣一種國內社會矛盾的叢生，也已經使得一般平民大眾陸陸續續開始有了怨言，甚至為了生存發展，開始走上街頭，試圖追求屬於公民的權利。³⁰也因為社會上的不安與不滿日益升高，中共勢必得再度調整政策，而這也造成包括宏觀調控等政策的陸續實施與挽救。

而「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概念，也就在這樣一種世紀交替、國內發展出現各種矛盾之前後所產生。所謂的「和諧社會」，它所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甚至是人們精神生活的和諧、人與社會和國家間的和諧。³¹這些論述的構築，一方面是為了弭平或削減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的各種不公不義現象，另一方面，則是中共為了轉移人們對於社會上各種矛盾層出不窮所使用的手法。基本上，對於和諧社會，也有狹義與廣義的解釋，狹義的說，和諧社會就是社會層面的互相協調；廣義來看，和諧社會就是強調社會與所有的

³⁰ 例如三農問題、山西奴工問題、童工問題與深圳的血汗公司以及廣西博白發生的抗議計劃生育的暴動等等。請參閱，俞文學，「山西奴工黑幕與胡溫對策」，**開放**，第7期(2007年7月)，頁10~12；陳破空，「國家型態的黑社會」，**開放**，第7期(2007年7月)，頁40~41；烏蘇里，「廣西博白抗計生大暴動」，**開放**，第6期(2007年6月)，頁15~17。傅清，「改革30年胡錦濤面對民主清算」，**動向**，1、2月合刊(2008)，頁16~19；另根據統計，中國內部在2007年整年度共發生遊行、示威等集會活動六萬餘件，參加人數一千二百多萬人，請參閱，田穗，「去年遊行示威集會創新紀錄」，**動向**，1、2月合刊(2008)，頁13。

³¹ 陳錫喜、包仕國、趙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重構」，**理論探討**，第1期(2007)，頁165。

相關事項皆保持著和諧狀態，包括與自然、與經濟、與文化等各層面的結合。³²

從十六大以來，中共對於鄧小平的「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的論述，就做了政策上與論述上的修改，轉換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江澤民在十六大的報告上，曾經做了如下的表述：

「必須看到，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鞏固和提高目前達到的小康水平，還需要進行長時期的艱苦奮鬥。

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十五大提出的到二零一零年、建黨一百周年和新中國成立一百年的發展目標，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

這次大會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目標，是與加快推進現代化相統一的目標，符合我國國情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符合人民的願望，意義十分重大。…」³³

基本上，江澤民的論述，體現出中共面對來自國內外的各項困局時，之所以能夠長時期穩固的執政，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總能夠適時的體察到民意的風向球，做出相關的政策論述或宣示。其實，要治理這樣一個具有寬廣國土的國家，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國內涵蓋著各種不同的種族，不同區域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與傳統存在，因此，要如何整合出一套最適合國家社會發展的方法，實為棘手之

³² 謝舜主編，**和諧社會：理論與經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1。

³³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江澤民文選—第三卷**，頁542~544。

難處；加以中共秉持著「馬列主義」的傳承者身分自居，各種的政策與論述建構，隨著改革開放與西方的接觸日益頻繁，仍舊不能夠完全擺脫馬列甚至毛的意識形態制約，可以說，中共的發展一直都受到馬列毛無形或有形的咒語所限制。

不過，到了江澤民、胡錦濤時期，他們雖然依舊宣稱是馬列毛鄧的傳人，仍然時時刻刻提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鄧小平理論，但是他們的作為與政策宣示，卻有很大程度的轉變，相較於毛鄧時期，有更多的開放空間。基本上，這是由於大眾心理因素的轉變，所造成的結果；也就是說，經過了長時期的改革開放過程，人民大眾雖然仍舊受到中共在教育、在思想與傳媒等面向的控制，但也確確實實獲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資訊，大眾心理開始求新求變、開始審視所謂的馬列毛帶給中國什麼樣的優勢，中共領導人面對這樣的情況，勢必做出一些回應，來減低人民的疑慮與可能帶來的紛爭。

不論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或是胡錦濤所希冀的「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其實都是中共面對種種社會矛盾產生之後，所做出的回應與應對方式。這些論述實際上是包含著由中國傳統而來的和諧概念與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所共同交織而成的概念，基本上也都是中共為了持續塑造人民認同、民族認同的必要手段，而這些手段，又都是中共藉以抵擋西方文化入侵的配方，可說是一系列的動態與建構過程。江澤民、胡錦濤在面臨到中共歷史發展以來持續面對的問題——西方潮流問題時，仍舊必須仰賴民族主義作為其護身符，而這樣一種民族主義，較之以往，則更加強調文化獨立的重要性，將和平發展問題拉進至民族獨立、保持民族特色的層次之中，³⁴訴求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仍能免於被西方文化所制約與影響，維持中華民族的獨特性。

特別是中共在建構這些論述時，時常以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概念作為配套，強

³⁴ 段鋼，「和諧社會構建中的文化支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第12期(2005)，頁67。

調中華民族這些悠久的歷史文化，只要稍做轉換，就能夠用來面對全球化浪潮下所產生的各項問題。其中，儒家思想中的和諧概念，就是一種被借用而來的工具。它強調了在統一體中存有具備差異性的個體，互依互存，動態但穩定的保持競爭，箇中也隱涵了各種的道德準則、「和而不同」的概念，³⁵以這樣訴諸於傳統文化的方式，使人民大眾在面對社會上的各種矛盾問題時，能夠有另一種層次與方向的思考邏輯，並藉以使社會矛盾的問題降低。

也就是說，中共從傳統文化之中，找出關於先賢們處理社會矛盾時的解決之道；不論是儒家、道家等學說，只要有提到人與人間的和諧關係、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自然本身的和諧關係以及傳統中的愛國主義意涵，就能夠被中共適時的引用。³⁶更重要的是，在馬克思的論述中，也能夠找到關於「和諧」的概念；馬克思指出，未來的社會，將是人和自然界與人之間矛盾解決的社會，³⁷人是自然存在的人，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或是人的自然，同樣的，人也是社會存在的人，社會亦是人化的社會，或是人的社會；人處在自然與社會中，都是與自然和社會相互支撐與保護的，而且，人與自然和社會，也是在一種不斷的復活與再生的過程中存在的，這是一種動態的、和諧的過程，也是一種互久的、永續前進的過程。

另外，自鄧小平、江澤民以來，中共的愛國主義，一定程度保護其免受太多西方「和平演變」所帶來的影響，同時間，其改革事業也能藉此穩步前進。但當全球陸續掀起一波波的中國熱，特別是在文化藝術界、體育界等領域之內，³⁸中共要面對的是新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有力並有效的推銷「中國」這項「商品」，或是在民族主義的框架底下，如何將中國文化傳至外地，但又不至於產生類似西

³⁵ 李鐘麟，「論儒家和諧思想與現代和諧社會的建構」，*東疆學刊*，第23卷第1期(2006年1月)，頁64~65。

³⁶ 謝舜主編，*和諧社會：理論與經驗*，頁121~132。

³⁷ 謝舜主編，*和諧社會：理論與經驗*，頁7~11。

³⁸ 包括電影「臥虎藏龍」的風靡、影劇明星周潤發、章子怡、成龍與李連杰等陸續參與好萊塢電影的拍攝與製作，籃球明星姚明、易建聯等人進入美國職籃NBA中，都造成了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化藝術與體育人才方面的重新認識與重視。

方所給人的那種「文化霸權」情況，以避免中國成為新的「世界中心」或「霸權主義」的擁護者。基本上，從九零年代初期，中共內部興起了為時不短的國學熱，一時間，社會上對於儒家、道家等傳統學說的復興與內涵，有著相當濃厚的興趣，傳統文化再度被引至檯面上的討論。

而除了國內層次之外，在國際關係方面，事實上，中共內部的學者或領導人也已經多次提出關於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不僅要以功為己，更需要世界理想，而這種理想就是「禮記」中所記載的大同思想。除此之外，中國國家領導人陸續提出的新安全觀、或是與他國的聯合聲明中，也都表明了其從「以和為貴」這樣一種從傳統文化出發的戰略思想，不同於美國單邊主義的霸權風格，走的是溫文儒雅的中國傳統文化典範，亦相當程度受到國際間社會的注意與檢視。

在此，我們要注意的是，中共長期以來關於國際事務的觀點，多是以宣示性、具有崇高理想性的標語做為宣傳，甚至具有濃濃的道義性質，³⁹但事實是否真如中共所宣示的這樣，仍存有相當多的疑問。不過，很重要的是，關於「和諧社會」或「和諧世界」的論述，由於牽扯到了中國社會「傳統文化」長久以來的內涵，更加能夠加深人民大眾的認同，並且可以轉移人民大眾對中國內部產生之問題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中國也不同于以往，開始將「傳統文化」有計畫的傳送出去至國際間，例如費孝通提出「文化自覺」的概念，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必須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確立自己的角色與位置，再來與其他文化互相截長補短，建立一種各種文化和諧共處的機制，季羨林則提倡「送去主義」，表明了將中國文化傳播的迫切性與重要性。⁴⁰這些推廣中華文化的呼聲，也讓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再度充滿信心，也更加顯示中共處理問題的日益多元與彈性。

³⁹ 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東亞研究*，第35卷第2期(2004)，頁24。

⁴⁰ 吳同瑞，「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與中華文明」，*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4卷第1期(2007年1月)，頁15~16。

上述的種種，也就是「孔子學院」等文化層次建設陸續出現的背後重要因素。這種文化的外輸，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經濟大幅發展之下所造成的結果。各國需才孔急，完全都是因為中國這塊市場實在是潛力無窮，又幅員遼闊，若是沒有或少於競爭對手的人才，則只會讓本身在中國這塊大餅上的發展落後甚至落敗。根據至二零零八年二月底的統計，中國已在世界各地陸續建立了超過 50 所的孔子學院，培育世界各國的漢語人才，並且將會陸續的開辦各式各樣的課程，不單單只有漢語的教授。⁴¹這種文化的反撲，相當程度也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來的，各國在追求發展的前提下，不得不配合時代潮流，配合「中國熱」，與中國政府合作開辦相關的事項，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這種趨勢只會更強而不會衰退。

這樣的浪潮，有效的提升「中華民族」在世界中的能見度與參與度，並使得中國能夠在西方國家環伺的國際現實社會中有效的「生存」。⁴²中共藉由推行中華文化的手法，將中華民族重新推入世界舞台之中，此舉更加能凝聚社會大眾的向心力，讓中共轉而能夠更有效的在國內推動各項政策與建構各種新的論述。如此這般的「和諧社會」乃至於「和諧世界」的概念，充滿著試圖維持長久的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宏遠目標，中共試圖藉由這樣的論述，與西方資本主義強權國家做出區隔，以求取其他地區國家與單位的支持和配合。

也就是說，中共在近期，已然看到了西方、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霸權主義，在國際社會上所造成的波瀾，實有增無減，且範圍擴及幾乎整個世界，這樣一種狀況，非多數國際社會中的行為者所樂見。而中共領導人在中國再度站上世界舞台的同時，利用日益增強的影響力，企圖降低西方國家所造成的各種影響；他們以和諧的理念，強調各個國家與民族、地區間的和諧共生，排阻或削弱西方強力

⁴¹ 孔子學院是中國為推廣漢語教學與中華文化所建立之全球性機構，由「國家對外漢語領導小組」管理，詳見，「資料背景：海外孔子學院概況」，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4/29/content_4491339.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6-03/03/content_4251291.htm。

⁴² 房寧、王炳權，「民族主義何以可能」，*科學社會主義*，第 2 期(2002)，頁 35。

推行的源自於「西方本身」之各項觀念。亦即，「和諧社會」或「和諧世界」之理念不單單成為中共在國內推行的任務，也成為新世紀中國在與國際成員間進行互動的重要依據。⁴³中共希冀以此種不同於霸權主義或單邊主義的理想型文化，區隔出其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霸權的不同，以得到他國的認同與支持，這樣一來，對於其在國內或國外的各項改革與發展工作而言，也能夠起到更積極與有效的功用。

第四節 小結

綜觀鄧後期到江、胡時期，中共在其民族主義的論述策略上，較之以往，有更為不同的手法產生。基本上，不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是中共在面對來自於國內外各項挑戰時候所形塑出來的論述和政策，這些論述也都相當程度的帶有著「民族」意涵在內，以降低外來勢力與國內不滿者造成的可能影響與衝擊，或維持民族主體的特性。

毛澤東塑造了一套神話般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雖然不想重蹈覆轍，再來一次神化運動，但他的接班人與底下的臣子，仍舊創造出「鄧小平理論」這樣的概念。當然，兩者之間存有著相當大的差別，那就是「毛澤東思想」到毛後期基本上已經停滯不前，喪失了它的能動性與積極性，同時變成文革時期造神運動的重要資料，甚至成為黨、國家以及人民大眾唯一的思想邏輯；「鄧小平理論」則去除了毛思想那般的專一性與獨斷性，更加強調實踐、實事求是的重要性，「鄧小平理論」比起「毛澤東思想」來說，似乎多了些彈性，加入了更多從前不敢加入的「西方」或「資本主義」的社會邏輯。

到了江、胡陸續上台掌政之後，我們可以看出，中共開始力求降低領導人個人的圖騰，「三個代表」就是「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就是「和諧社會」，「科

⁴³ 姜述賢，「關於和諧世界理念的幾個問題」，*馬克思主義研究*，第1期(2007)，頁25~27。

學發展觀」就是「科學發展觀」，本來應該是江澤民理論、胡錦濤理論，現在就以他們所論述的內容做概括，形成「三個代表」思想、「和諧社會」思想等等。當然，以中共的政治生態與歷史過程來看，在此也不能夠斷然做出結論，認為將來不會出現「江澤民理論」、「胡錦濤理論」，但基本上，中共發展至今，確確實實多了些生存上的彈性，以順應潮流與時勢。

江、胡時期的中共政治，民族主義仍然掩蓋不了它銳利的一面。其實，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照理說將紛紛形成一體化的大社會，彼此的交流與聯繫也較之以往更為緊密，但是各地的民族主義與民族運動卻仍然時有所聞，甚至更加普遍；⁴⁴中國身為打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旗幟的大國，在這樣的世界波動之下，也不免遭受或多或少的影響。從毛時期以來，要是遇到這樣的情況，則幾乎都以強力的由上至下來推行的各項運動、民族運動藉以抵擋，以「民族」的聲音或以流行一點的術語來說，就是「民意」，使得外來文化與西方浪潮沒辦法太輕易的流入中國社會，有的也只是由毛澤東、由中共領導人檢查過的、修改過的片段可以傳入。

時至改革開放、中共第三代領導班子陸續上台之後，中共限制外來文化、西方思想的工作仍舊持續。雖然在經濟改革層次上，他們引進了西方式的市場經濟，以活絡整個社會的發展，但其仍宣稱這樣一種體制是社會主義式的市場經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下所發展而出的一種新型的發展模式，將經濟改革的作為，相當程度的仍然連接甚至上升到「民族」、「國家」的層次之上，以此繼續保有中國的獨特性與主體性，並且有效的藉由塑造「中國特色」使得社會主義乃至於共產主義仍可能繼續在中國內部發展與存有，此外，還因此讓中共統治中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再次獲得保障與確認。

⁴⁴ 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著，龔維斌、良警宇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頁 1~2。

江澤民與胡錦濤時代與毛澤東、鄧小平相比，其操縱或煽動民族情緒的手法，不因為中國在經濟改革上獲得了一定的成功與受到世界的重視而有消退的跡象，反倒有更加強的趨勢。基本上，由於以美國為領頭的全球化浪潮相當強勁，在社會「被迫自願」進行「同化」的同時，為了降低全球化所帶來的可能影響，包括喪失民族的主體性、民族認同感的降低等等，各種「保護主義」或「本土派」的活動也順勢而起；而經濟一體化與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的強勁擴張，不僅只在經濟面造成影響、對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也造成不小的衝擊，民族的身分變的更加不安與不確定，⁴⁵這也是江、胡等中共當代領導人所面對到的相當重大的問題。

因此，江、胡時代，中共雖然持續在經濟上進行改革活動，以更為務實的態度面對發展工作，但在此同時，他們仍然需要維持自身的主體性與特殊性，以避免被西方或美國過度的「同化」。另外，中國長久以來具備了悠久的文化與文明傳統，較之西方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在近代以來，清朝所造成的「落後中國」並沒有因為國民政府、中共的陸續掌政而有太多進步，但是，人民大眾的「民族自尊」，並沒有因為這些挫敗而減低；而時至改革開放之後，西方、特別是美國文化的衝撞與傳播，帶給中共領導人新的著力點，以重新塑造一套「中華民族」的認同、重新強調「中華文化」的優勢，企圖降低西方文化在國內所造成的影響與改變，以有利於中共的政策與各項方針得以實踐與落實。

基本上，「中華文化」在這個階段中，又有重新抬頭的傾向。從九零年代中期的「國學熱」，到近期熱烈的討論「論語」等儒家經典等活動，⁴⁶中華文化不僅

⁴⁵ 王寧，「全球化、民族主義與超民族主義」，*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7期(2007)，頁50~51。另外，經濟的一體化，包括加入WTO、IMF等國際性的經濟組織，使得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必須與其他國家或經濟體一樣，遵守這些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組織，相當程度被迫喪失了或降低了本身的自主能動性，以求得在國際間的生存。

⁴⁶ 例如在2006年十一黃金週期間在中央電視台所掀起的一股論語旋風，「百家論壇」的主持人于丹連續七天解讀「論語」心得，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並且出了討論論語的專書——「于丹『論

僅只是一種口號性的論述，更在實際上，被提出到檯面上來討論。當然，這樣一種「中華文化」的反撲，媒體與國家機構、知識份子仍然佔有相當大的推動力量，中國自九零年代中期反批西方妖魔化中國之後，陸續以中共在國內媒體中的優勢，挑動民族的情緒，並且輔以在學術界的知識份子，以其專業性與中立性，提出其他的民族主義式的想法與論述，透過媒體傳播至一般大眾的思維之中，並且確實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從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在經濟層次上的開放，使得中國無法避免的受到西方與美國的強力影響，國內的言論與政策的實行較之以往也有相當程度的鬆綁，但是只要越來越多人開始討論這樣的議題，或有可能影響到中共所認知到之社會的穩定結構，則適時的形塑民族主義就成為中共最有效的應對手法。江、胡時期中共面對到的西方挑戰更加嚴峻與頻繁，也因此，其更加強這樣的力道，把層次拉高至民族國家，甚至用國家取民族而代之，並利用「三個代表」等言論，將中國等同於中共，以彰顯中共的唯一性與正確性，將中共包裝成為代表中國、中華民族的代言人，藉此使得中國的主體能動性能夠獨立的存在，避免過度的被西方/美國所制約與影響。

當然，中共在保護自身主體性持續存在的同時，也企圖將代表中國的文化意識形態透過全球化向外輸出。這樣一種做法，較之文革期間外銷中共的革命經驗，實有雷同之處；中共可以在獨善其身的民族主義、排外的民族主義浪潮下，同時以世界主義的概念，推銷中國的經驗與文化。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中共的民族主義發展至今，實際上是相當獨特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嶄新的民族主義建構模式。

語』心得」。請參閱，人民網 <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42223/75453/index.html>